

唯增长主义将引发巨额健康赤字

空气污染、食品安全频发等引发的肿瘤病高发和年轻化趋势，与贫富差距过大、公共服务不均衡等一样，都是唯增长主义理念带来的健康赤字。它警示我们透支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可承载能力的GDP高增长，是一种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模式，它侵害的不仅是人的健康，而且从长远看，它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也将非常高昂。适当放慢经济发展速度，预防和治理污染不仅仅是为了人们的健康，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是一种合算的行为。

刘晓忠

近日，阴霾天气笼罩中国大片地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3日零时，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PM2.5)超过300微克/立方米的严重污染水平，其中北京为786(西直门监测点高达993)，天津为500，石家庄为960。

目前中国大多数地区监测数据只是笼统地公布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没有细化PM10和PM2.5，而人的呼吸道防护组织对直径小于2.5微米的浮尘几乎无能为力，因此污染物更容易在肺部沉积而直接伤害人体健康，PM2.5是肺和支气管疾病的罪魁祸首。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安全标准是PM2.5年均不超过10

高速公路春节免费：莫让拥堵噩梦重演

张欣

前天听王自健相声调侃国庆长假高速公路免费，说是高速公路一免费就成了“免费停车场”，拥堵十几小时动弹不得，于是车友们在公路上打牌，撒尿……有人说，因通行效率低而多花的汽油钱和时间，远远超过了省下的过路费。

想起那拥堵，笔者现在还心有余悸。可是，交通部现在又宣布2013年春节假期2月9日~15日中国收费公路免费通行。难道有关领导春节还要大家重温一次拥堵噩梦？

经济学的需求法则说，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中国大部分高速公路容量并不宽裕，春节期间本来车流量会增加容易拥堵，现在你再来个免费通车，不阻塞才怪呢。作为消费者大家自然希望样样商品能“免费”或者低价，可是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取之不尽的免费资源。不要说高速公路空间，现在连不受废气污染的空气也是稀缺品。免费造成的短缺事实上反而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大家还记得，广州大运会期间政府拍脑袋来个地铁免费，结果乘客拥堵秩序混乱不堪，地铁没法正常行使，后来不得提早收场。恢复收费后地铁秩序马上正常，广州居民才算松了口气，生活正常了。北京机场高速本来是顺畅的，取消通行费

收入分配改革缓不得急不得

付建利

公众伸长脖子期盼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原定于去年6月出台，但因多方阻力和利益博弈而两度推迟。稍可让人宽慰的是，最新消息显示，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经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进一步的修改和沟通，如果顺利的话，方案将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出台。

现在人们对改革期待很高，其中就包括收入分配改革。然而，收入分配改革确实不能单兵突进，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问题，更涉及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政治改革等多方面，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收入分配改革的有序推进，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它是一项“缓不得”，又“急不得”的系统工程。

收入分配改革确实“缓不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整个社会会因为收入分配不公急剧的怨气、怒气潜滋暗长，对社会的稳定和谐构成威胁。改革的目标，从物质方面来说，就是让社会财富的分配建立在公平和有效的市场化

微克/立方米。

去年上半年，中科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霾粒子浓度尤其是PM2.5浓度与肺癌致死率的相关性高达0.97，且滞后期长达7年。正因为此，人们担忧若空气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其严重后果将在多年后爆发，例如肺癌等恶性肿瘤会出现高发。这并非杞人忧天。国际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去年3月刊发的中国医疗专题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比例为12.9%，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有1.73亿人将陷入肿瘤等慢性病。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2012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粗略计算出，中国每年肿瘤新发病例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二点三，显著高于全球的千分之一点五。相比美国等主要以前列腺、乳腺癌等为主的新增肿瘤病例，中国新发

后从原来半小时路程变成了一个半小时，增加的汽油费远远超过原来的过路费。一车主网上抱怨，“恳请有关部门重新让机场高速收费……机场高速已经可以叫机场‘堵车’了！我要付钱！还我速度！”

经济学调节稀缺资源的有效工具是价格杠杆。春节期间容易拥堵可以用增加过路费来解决，现在交通部却违反经济规律反其道而行之，结果一定是又一次高速拥堵噩梦。勿谓言之不预也。

另外，很多高速公路是私人或者地方政府投资建设所有的，不少由上市公司所有。通行费是投资回报收入的主要部分。交通部既非所有者，也非经营者，在没有取得授权和广泛听证下擅自决定免费，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交通部擅自决定的春节高速免费通行，其动机也许是出自为民的好意，或者以笔者小人之心态君子之腹，也许是出自某些官员的政绩秀目的。但是，这一政策最后必定是：慷投资者之慨，损车友之利益，污大众之空气，穷地球之资源，害政府之信誉。李稻葵抨击说国庆长假高速免费决定创造了“世界愚蠢政策的新纪录”，难道此次春节还要再破纪录？

(作者为旅美学者)

肿瘤病例则以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管癌为主。数据显示，美国肺癌等诊断时的年龄中位数为72岁，而中国肺癌发病人群日趋低龄化、幼龄化，肿瘤发病年龄提前了15~20年，如目前35~55岁发病群体比率趋向上升，肺癌原来在40岁以上人群高发，现在25岁人群的肺癌发病率上升，乳腺癌发病年龄已提前到20岁，其中30岁以下青年患者已占到全部患者的5%~20%等。

这些统计数据显示，空气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因素是导致目前中国以肺癌为主的肿瘤等慢性病高发的原因，有专家预测，到2033年中国肺癌患者将会达1800万人，相当于上海总人口。这个预测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假设现有医疗条件不变，按照PM2.5引发肺癌的滞后期为7年，考虑到癌症患者存活数据，这意味着从目前至2033年将有数千万人将死于肺和支气管癌。

PM10和PM2.5等数值超标，根源在于工业生产、机动车尾气、建筑施工等，它是粗放式经济增长和“唯增长主义”政绩观的产物。这种短视的发展观，在制造短期繁荣的同时，不仅直接危害人们的健康，而且未来医疗上的巨额支出将会大幅抵销掉短期经济产出。灾难性医疗支出如同侵入经济体的恶性肿瘤，侵蚀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鉴于目前城市肺癌发病率趋向于白领、富人等，而富人和白领相对农村居民具有相对较高的支付能力，以及较强的治疗诉求，因此随着城市居民肿瘤发病率指数上涨，将严重加剧医疗供需矛盾，也对已经承受压力的社保体系陷入更大的压

力。而患病青壮年还会因为无法工作，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要有效修复当前的环境污染，降低因环境污染等导致的大病发生概率，需要数十年时间，且其耗费的资源显著高于破坏环境所获得的收益，因此一代人对自然的攫取和对生态的破坏，需几代人的努力方能抚平自然和生态伤口，解除自然和生态对人类的魔咒。

由此看来，目前国内肿瘤等发病率上升已不再是个别问题，而愈发成为公共卫生风险，我们认为若当前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疏导治理，把环境保护和修复放在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位置，那么，未来肿瘤疾病侵入的就不是单个人的身体，而是整个经济社会的肌体。

当前空气污染、食品安全频发等引发的肿瘤病高发和趋向年轻化，如同贫富差距过大和公共服务不均衡等，都是唯增长主义理念带来的健康赤字。它警示我们透支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可承载能力的GDP的高增长率，是一种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模式，它侵害的不仅是人的健康，而且从长远来看，它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也将非常高昂。放慢经济发展速度，预防和治理污染不仅仅是为了人们的健康，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是一种合算的行为。当前，屡屡发生的严重环境污染警告我们，告别“唯增长主义”，注重环境与自然的协调是一件极为迫切的事。

焦点评论



宁波反腐，高级酒店受不了

中央重拳反腐败，公款消费降下来。星级酒店订单少，地方官员使舵快。眼下积极吹新风，未来务必促政改。吃喝禁令难治本，权力监督是要害。

赵顺清/漫画
孙勇/诗



切好新型城镇化利益分配的蛋糕

在新型城镇化40万亿投资的利好刺激下，股市绝地反弹，短短1个月，上涨300多点。40万亿是怎么算出来的？40万亿PK2009年的4万亿，中国经济会消化不良吗？在昨天甘肃卫视《新财富夜谈》节目中，财经评论员叶檀、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共辩中国新型城镇化中的利益博弈。

牛凤瑞：每年至少需要20万亿

城镇化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的说法，最早是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迟福林提出。迟福林认为，未来10年新增加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而牛凤瑞则认为城镇化每年至少需要20万亿。

牛凤瑞：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每年扩大1500到2000平方公里，一个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的基础设施配套要20亿，就是每年是3万亿到5万亿。再有一笔账，很多城市基础设施老化退化，要更新改造，中国每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30多万亿，其中70%投向城市。这样，新城镇建设和老城市改造的投资两者相加，则每年至少要20万亿。

近日有消息传出，由发改委牵头起草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上报国务院。《规划》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那么天量资金从何而来呢？

要公平切分土地利益蛋糕

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指出，自从90年代末城镇化开始后，我们看到矛盾越来越尖锐。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只有政府才有权力把农用地变成城市用地。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用低价补偿农民，高价出售给开发商或者把土地拿去抵押贷款。这样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就产生严重矛盾。

牛凤瑞：我从来不认为土地财政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中性词。关键是政府如何用好土地财政，而不是简单的否定问题。作为农民来说，我的土地被征了首先我的合法权益应该保护。实际上在中国大都市的近郊，因为被征地被拆迁而一夜暴富的，可是大有人在。相反在一些远郊城市的边远农村，因为水库占地、高速公路建地，对农民利益造成了损失。他们就不应该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吗？你不通过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行吗？关键政府要公平的切分土地利益的蛋糕。

李慧勇：土地财政融资模式要区别对待的。第一个情况是“锤子买卖”，比如“裸批”一块地，地价卖得不错，但是招商引资进不来，城镇化发展不起来，这个就是非常失败的城镇化。但是如果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使得地价上涨，带动周边地价上涨，为城镇化源源不断的获取资金，我认为，这是城镇化的成功模式。

叶檀：土地级差地租是客观存在的，有的人分到了很大

的一块蛋糕，有的人分到的蛋糕就比较小。分到小的蛋糕的人越多，他反对的声音就越大。靠土地级差地租来获取城镇化资金的原始动力有可能会受到挑战。

李慧勇：我的提法是要把土地财政加信贷的融资模式，转为以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为主，信贷为辅的多元化融资。通过资本市场或者货币市场去发行债券，毫无疑问会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把一些烂项目，一些“长官意志”的东西给压制到最小，这样实际效率会提升。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0年~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完成从50%~70%的跨越。2030年后中国老龄化进入高峰期，留给我们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学者对城镇化保持乐观，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这是中国未来20年保持8%的增长率的支撑点之一；美国经济学家史蒂夫·罗奇则认为这“可确保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达到6.9亿人。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户籍人口和居住超过6个月城镇常住人口划分的。其中，对2亿多流动人口的划分存在巨大的争议。

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表示，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还有两亿六千三百万人是流动人口，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有固定的住所，不能算真正的城市化。扣除这两个亿六千三百万人，我们现在城镇化率还不到35%。

而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则认为，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全国非农就业人口”估算，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其动力已比较有限。

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市民化应该是城镇化的重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指出，城镇化的本质是，如何使已经在城里工作的，原来我们把他冠之以农民工的这些人，真正成为市民，让他们充分享受城市居住、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则强调，假如农民工在城里长期得不到一个稳定的居住的条件，享受不到社会福利，等他们年龄大一些，可能会回到自己的老家去，这样就会出现“去城市化”的问题。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财政。但实际情况表明，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直辖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镇化水平脱节。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挑战。

李慧勇：在问与大家愿不愿意给农民工户口的时候，大家都说给个户口嘛，很简单，没问题。但是愿不愿意给有户口的人相应的一个公共福利的时候，大家都说可能还做不到。我们现在的财政叫国家财政，但是客观来讲它叫城市财政，户籍人口财政。我们每年下级向上级“跑部要钱”的时候，就是按照户籍人口给的经费。财政预算上不给保障，但要负担流动人口的生老病死，钱从哪里出？所以说户籍制度是“笨”，真正的财政管理体制是“笨”。财政管理体制不改革，想要这些人过上城市人一样体面的生活是一种空谈。

(文字整理：陈靓)

《新财富夜谈》是一档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制作、每周日晚23:17在甘肃卫视播出的高端财经直播访谈节目，由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女士担任嘉宾主持。本版每周一回放该节目主要内容，敬请留意。